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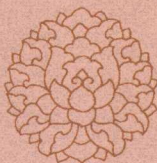


清华经济史论丛
主编 李伯重 龙登高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修订版



李伯重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013027496



清华经济史论丛
主编 李伯重 龙登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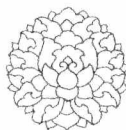
F129
65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修订版

李伯重
著



F129/65



北航

C1636902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
李伯重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308 - 10814 - 0

I. ①理…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史 - 研究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220 号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修订版)
李伯重 著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49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10814 - 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历史学是沉入水中淹死在河底呢，还是胜利地浮出水面，登上彼岸，获得新生，重新充满着活力，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出版缘起

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是 20 世纪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奇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成了国际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清华大学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张荫麟、梁方仲、严中平、杨联陞、何炳棣、吴承明等几位在 20 世纪国际中国经济史坛上最著名的学者，都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因此可以说，清华大学与中国经济史学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近年来，清华大学引进了一批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才，他们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并且积极活跃于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使得清华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近期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标志着这个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反映清华大学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入选的著作都经过严格挑选，可以说代表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现今所达到的水平。这套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动态地反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不断进步、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我们相信，随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精品出现在这套丛书中。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宝贵的批评和指教，帮助我们做好这套丛书。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

2002 年 5 月

总 序

清华大学经济史学科的重建始于 20 世纪末。在清华大学“振兴文科”的部署中，李伯重、陈争平、秦晖、高淑娟、龙登高、仲伟民等经济史学者相继被引进清华园，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团队，并于 21 世纪之初，建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晚近，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作为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优秀人才加盟清华，在清华建立“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推动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等基础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在龙登高教授的主持下，经济史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创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书写古今货殖列传。因此到了今日，清华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已颇具规模，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清华经济史学科注重国际视野，立足学术前沿，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主编有“社会经济史译丛”，将一批国际经济史学家的力作及时译成中文出版，反响良好。学科还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辟“海外学潭·经济史”专栏，介绍国际名家、名篇。

清华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多种经济史研究与交流平台还包括“清华经济史论坛”，专门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特别是海外学人）来介绍其最新研究成果或国际学术动态；每年主办或合作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清华—北大经济史沙龙”，随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加盟，四方联合展开学术交流与争鸣。

这些学术平台推进了清华经济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

了集中体现学科成果，21 世纪之初出版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今简化为“清华经济史论丛”。除了继续推出清华经济史学者的力作之外，也将上述学术活动与平台的成果结集为书出版。为了重振清华经济史学科，发扬光大清华前贤的传统，丛书亦将清华园走出去的当代经济史大师的成果整理出版，这些成果包括 20 世纪国内经济史研究领军学人张荫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在海外学界发展的何炳棣、杨联陞等，及在清华从事与经济史相关研究的大家如梁启超、张岱年等。此外，清华经济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这些后起之秀的出色成果，也将精选出版以展现学科发展的未来希望。

清华经济史论丛编委会
2012 年 8 月

增补版序

本书初版于 2002 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原书分上、中、下三编，共收入十二篇文章。此次重版，主要的改动是增加了一编，成为四编，文章也增加到十六篇。原来的下编“发展趋势”，被分为第三编“发展”和第四编“趋势”，书名也由原来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相应改为《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新增第三编“发展”，收入了四篇文章，分为两个专题，前一专题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科自 20 世纪初出现以来的发展历程，后一专题则观察今天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通过这个回顾和观察，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史学科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更好地看到其今后的发展趋势（此趋势将在第四编“趋势”中讨论）。

由于增加了这四篇文章，因此我对本书“前言”第三小节“本书主要内容及所收各篇文章的出处”和书末的“征引文献目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此外，本书的韩文版于 2006 年由韩国 Chaek Se Sang（书世界）出版社刊出。当时我写了一个韩文版序，其中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等问题，这对我国的年轻人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今天国际学坛中的重要地位，应当也有所帮助。因此，我也把韩文版序收入本书的增补版中。

本书初版曾蒙先父李埏先生题写了书名，但是他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驾鹤西去。此次出增补版，依然使用他的题签，只是把“发展趋势”改为“发展、趋势”，作为对他的追念。

最后，本书增补版的刊出，得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王志毅先生的热情支持，编辑赵琼女士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深表谢忱。

李伯重
癸巳新年
于香港科技大学

韩文版序

中韩两国自古是亲密邻邦，彼此之间有着长达千年的友好关系。近年来，两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更有巨大发展。2005 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 1 000 亿美元大关，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此同时，中韩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升温，现今中国风行的“韩流”和韩国兴起的“汉语热”，即是一个重要表征。

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奇迹”。所谓中国经济奇迹，指的是中国在近年来出现的高速经济成长。在从 1979 年到今天的 26 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 8%—9%。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大经济体在如此长的时期中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尚未有前例。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所长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曾在 1989 年说：从 18 世纪后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开始，用了 150 年的时间，才使占今天世界人口 23% 的欧洲（包括前苏联集团）和北美成为享有高生活水平的工业化地区；而如果今天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在四五十年的短时期中，就可使占今天世界人口 23% 的中国加入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大大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1989 年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且根据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测，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中，这一增长还将继续下去。因此珀金斯教授的预期是一个可望亦可即的前景。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经济奇迹”？这是今天世界各国学者、政

治家、工商界人士乃至社会大众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们对此问题的答案不胜枚举，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的中国经济长期演变的结果。用柏金斯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过去的继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虽然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剧变，但是她过去的经历仍然在今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放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奇迹为何和如何出现，以及为何和如何能够继续下去。

经济史，依照吴承明先生的说法，就是过去的经济实践。要认识过去的经济实践，离不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史学起源于西方，在20世纪后期以前，西方经验一直是构成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西方经验的局限性未被重视，从而造成在对非西方社会经济的研究中，学者们实际上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的。这就是西方中心论。以往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也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的。20世纪国际中国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主要理论模式（如“冲击—回应”、“近代—传统”、“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停滞”等理论），出发点都并非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企图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世”模式的重复。尽管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采用了各种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是他们并未考虑过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是否能够适用于非西方社会，而是将其作为无可置疑的真理，并由此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把西方经验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做法，正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从西方中心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柯文（Paul Cohen）提出了中国史研究中应树立“中国中心观”。然而问题在于：现代国际的主流学术的整个体系都产生于西方，从而不可避免都带有西方的色彩。在此背景之下，真有可能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吗？黄宗智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应当破除旧有的“规范认识”，“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如果真的破除了旧有的各种“规范认识”，“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又依靠什么作为基

础来建立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以“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代表的学者，在更深入地批判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不赞成采取“中国中心主义”，而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和有可能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现代主流学术分庭抗礼的新学术体系，现代国际主流学术中的不足应当克服，但不应全盘否定。他们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并把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研究中，从而得到学界重视。这些学者大多数是社会经济史学家，因此他们的工作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也被认为是“加州学派”成员之一。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随着自己认识的提高，我对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并把所获得的新认识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出来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为了方便读者，我于2002年把若干文章结集出版，成为此书。刊出后，学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封越健在《中国经济史学会通讯》（北京）2003年第1期、李贵民在《成（功）大（学）历史学报》（台南，2003）第27号上发表了书评，杨念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历史学》（北京，2003）中也对本书进行了评介。

由于密切的交往，在近代以前的长时期内，朝鲜学者曾留下了许多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第一手记述，这些记述都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宝贵文献。到了20世纪中期韩国获得独立后，韩国学者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像吴金成教授等明清史学者的著作，使我受惠良多。过去和今天韩国学者在中国历史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一直很关注。早在1988年我在美国UCLA讲学时，就把李朝学者崔溥的《漂海录》复印下来带回国，与中国同行分享。2002年，我应邀到汉城大学开会，并参观了成均馆大学，会见了许多韩国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讨论。韩国学界对中国经济史具有这样的兴趣，让我非常高兴，也希望能够为加深中韩学界在本领域中的交流，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本书译者李和承教授是一位优秀的明清史学者，也是在中国明清

史学界知名度最高的韩国学者之一。他曾在台湾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并经常访问中国大陆，与大陆和台湾的明清史学界关系都非常密切。因此他对于中国明清史学界的了解之深入，在韩国的明清史学者中罕有其匹。他用中文写作并在中国发表的论文如《明代传统商人与职业神》、《明清传统商人区域化现象研究》等，都深受学界好评。多蒙李教授的好意，把本书译为韩文，介绍给韩国读者，我感到非常荣幸。由于他不仅精通中文，而且又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史学者，因此由他来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对于他力图把本书介绍给韩国学界的好意和他所做的出色工作，我感激不尽，在此深表谢忱。

最后，对本书韩文版的面世谨表热烈祝贺！

李伯重

2006年4月

前言

一、经济史学的危机与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滞后

中国经济史学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出现于 20 世纪初，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这个学科自出现后，在我国的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有“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之称的几次大争论^①，再到 70 年代与 80 年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化道路”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可以说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经济史学在我国学坛上出尽了风头。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论题与结论也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共识。哪怕是对于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中小学生，也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然而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衰落
的迹象。过去的“金花”已成为明日黄花，史学工作者们关注的焦点

^① “文革”前全国史学界曾就中国历史上的五个重大问题展开过持久而热烈讨论，被称为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而在这“五朵金花”中，就有四朵（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属于经济史研究，或者与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

也开始向经济史之外的领域（如社会史、文化史）转移。当年曾长期是史学的“老大”的经济史学，今天已经面临危机。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情况并非我国的经济史学所独有，而是全球“史学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个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益加剧，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现在仍没有减弱的趋势。这个危机对整个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但主要矛头又针对的是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同时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出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尝试。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①。由于经济史学跨处历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因此它也从经济学的发展中受惠最多，成为在历史学内部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学科分支。在近年来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变革浪潮中，经济史学也由此而一马当先。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在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中，富有新见、深具挑战性的论著连连推出，在学坛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像本书中提到的斯波义信、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黄宗智（Philip Huang）、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eth Pomeranz）、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就是主要的代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观点，并对研究方法的改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5、114页。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国际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导致全球性“史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对中国的经济史学同样也起着作用。^①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特殊的环境，这种由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引起的危机，在中国经济史学中表现得格外严重。中国的经济史学在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同时也受到苏联教条主义的颇大影响。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既然是方法，就必定有其局限性^③，必须在使用中根据实际加以发展。但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一种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也未能主动吸收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未能更多地从这些学科的发展中受惠。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致使许多学者对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与此同时，不少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到国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填补真空”的作用。但是被介绍进来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有限，而且其中有许多也未必是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有些虽然是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否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工作却往往做得很不够。一些学者在尚未对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深入的了解之前，就将其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这种“食洋不化”的做法，对我国学者了解和尝试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造成了颇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更加难于“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国外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并未引起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的真正重视。

理论和方法既少创新，经济史研究当然难以发展，经济史学的衰

① 以下讨论，详见本书所收的第十一、十五两篇文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③ 吴承明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衡量，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参阅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落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是向社会提供关于经济变化的深层原因和长久趋势的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学衰落了，社会就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正确认识。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将是我们经济史学家的失职，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常言道：危机就是转机。就此意义而言，今天经济史学所受到的挑战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对史学本身所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经济史学的前途也正依赖于这一反思的结果。经济史学要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经济史学家不应追求时髦，但应追赶时代。强调这一点，引起大家的思考，正是本书目的之所在。

二、若干技术性说明

在将有关论文收入本书时，有几点技术性说明如下：

第一，遵循现在的国际学术惯例，在有关讨论中涉及的学者，除个别地方（主要是在书评的开始提到著者时）外，都只直书其名，而略去了诸如先生、教授等尊称或头衔。在学术讨论中，所有学者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注意的只是其意见与看法，而非其身份与地位。

第二，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倘若学术真的要发展，就不能不面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而指出其不足绝非否定其成就。因此本书在讨论问题时，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前辈学者的观点也采取“临文不讳”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评述。当然，这样做并不影响我对这些学者及其成就的尊重。任何新见解都是以前人见解为基础的（哪怕是两者看法截然相反）。即使是对前人的某一见解提出批评，那也是因为这种见解有重要的价值，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了。

第三，由于本书所收论文发表时间前后不一，有些问题在较早的文章中进行讨论时，所引用我本人的某些论著尚未刊出，因此只能注明其名称和章节。但是到了现在，这些论著已经出版。对此，我在脚